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六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三六期 ——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2c）

【史海钩沉】	李讷、林豆豆、宋彬彬	王友琴
【各抒己见】	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叶维丽
【口述历史】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等·卜伟华·米鹤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李讷、林豆豆、宋彬彬

• 王友琴 •

在开放杂志第一期上金钟先生写了关于不久前去世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文章。他介绍了她的书在历史上的意义，特别还写到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三十年前对他自己思想成长的深刻影响。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那篇报导她的死讯的文章，以她的父亲、四个丈夫和三个孩子为线索介绍她的一生。那篇文章简直像是在用一种旧式的观念介绍一个旧式的女人，离开了斯维特兰娜其人其书在国际共运史上的意义和思想价值。

◇ 中国没有斯维特兰娜式的人物

网上中文有关文章的资料大多来自这篇报导，而且在翻译转述过程中，又多多少少扩大和渲染了她离开苏联后的生活不安定以及贫困。比如，英文报导中提到她在美国结婚后又离婚的丈夫的家世，其原因之一是这个姓氏在美国的建筑界和艺术界极其著名，在博物馆美术馆中位置显赫，而中国人一般不知这个名字也就没有感觉。

在世俗的眼睛里，渲染斯维特兰娜晚年生活的孤独和默默无闻，可以贬低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然而，这样做大可不必，因为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记载中，并没有出现过斯维特兰娜式的作品，也没有过她这样的作者。

在这里，斯维特兰娜的名字，是代指那些从高层权力家庭里出来的子女中，能超越自己的环境，独立思考 and 批评父辈的所作所为，以及反省和选择他们自己的人生走向的人。

汉语中没有出现和斯维特兰娜相似的书，但有一批和斯维特兰娜身份相似的人。她们作为和思想风格却是与前苏联这位反叛的第一公主，有天壤之别。而且，是数十年不变。以我所知，“北大夫人”就讲述过他们遭受“红色公主”们打击的往事。

◇ 毛的公主李讷在北大历史系

北京大学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毛泽东称为“反动堡垒”进行重点打击，文革前还是“最高学府”。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在文革前一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这和斯大林命令女儿进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一样。不过斯维特兰娜没有对莫斯科大学作过甚么，和李讷不一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上，在北京大学东操场的全校万人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宣布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是“革命行动”，然后话锋一转，指控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李讷。会场上马上有人大喊“把反革命分子郝斌揪出来”。但是因家人生病他已经提前退场回家。第二天郝斌到校就被关进了校园“劳改队”。一次他遭到“斗争”时，同一教研室的一名同事，认为他是江青点名的“死老虎”，永远翻不了案的，重拳出手把他打昏倒在地上，又拖出门外。（文革中学生打人比较常见，教员出手打人比较少见。）结果，也确实是在十年后毛泽东死亡、“四人帮”被捕，他才得到“翻案”。

郝斌的一名同学在文革后告诉笔者，他毕业后分配到外省工作，文革中看到大字报上江青讲话指控郝斌“迫害”李讷，很是吃惊，后来见到郝斌，还拿这个事情开玩笑：你怎么还“竟敢”作此等事情。不过在文革时，这可是一点都不可笑的事情。

当年的大字报有抄件在。所谓“迫害”李讷，是指北大历史系师生一九六四年到郊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划分阶级成分”时，因为划高划低，郝斌和李讷发生过争论。当时争论并不激烈，他自己都未曾特别注意。但是李讷回家报告了江青。于是就发生了家长对女儿的老师在大会上宣告定罪，并煽动学生同事“斗争”殴打老师的千古奇闻。

李讷在文革中受毛的派遣，多次到北大来。有一次传达了毛泽东把攻击北京大学“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导致了北大更大规模的迫害。当郝斌被大字报“揭发”时，他在一九六四年最“严重”的“反动言论”也不过是预警了“这样搞下去会死人的”，在文革中“死人”变成了北大的现实。六十三人在北京大学被迫害致死（我调查所及的大学都有两位数的受难者）。但是，不论是对于全校性的这种灾难，还是和李讷个人直接相关的迫害郝斌，李讷在文革后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表示过歉意。

◇ 林彪公主林豆豆在北大中文系

普通人的道德观念是在公共汽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要说一声“对不起”。但是还有另一种道德观念是害死伤害了人也不必道歉。

文革中当了第二号权力人物整整五年的林彪，有一个女儿林豆豆上过北大中文系。她原在

清华，一九六四年转学到北大（当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到北大后她长期缺课，时间超过了学校章程所规定的病假天数，中文系在请示了学校领导后（一般不必），请林家给她办理病休手续，并告知病好了可以复学。林豆豆后来从未要求复学，而且在文革中当上了《空军报》主编。但是她被要求办病休手续，文革中却变成了“迫害林副统帅女儿”的大罪名。林豆豆的弟弟林立果在北大“揭发”此事，有关的人都被“揪”出来。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和代理教务长王学珍二人，都被用布袋子蒙头，绑架到秘密地点，遭到审问和殴打。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专为这件事，在北大最大的会场召开“斗争会”。所有和此“案”有关的人在台上遭到野蛮的羞辱和折磨。

文革后，林豆豆从来没有跟北大人道过歉，尽管她就在离北大十公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在，向景洁老师已经去世，王学珍先生八十六岁，住在北大宿舍。林豆豆过去没有去道歉，将来会去吗？

她的一名同学说，她来过他们班级的聚会，大家觉得她还“生活在过去”，优越感犹存。她几次提到最近去了甚么大人物的家。

◇ 宋彬彬至今不为文革暴行道歉

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此案已为中外很多研究、关注文革的人所知。当时担任学校革委会负责人和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也是“红色公主”级的人物。她因文革中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而出名，在学校九十年校庆时，竟成为九十名光荣的“知名校友”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卞仲耘丈夫王晶尧不得不以公开信方式提出强烈抗议。

这一公开信没有得到校方或者教育部门的任何答复，没有得到宋彬彬和其他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答复。这封信也没有能在国内纸质媒体上发表，只是由王晶尧的年青朋友帮助送上了电脑网路而得到了“公开”。

二〇一〇年，北京一家名为《记忆》的网刊发表了宋彬彬等五人的一个座谈纪要和一些其他相关文章，共五万多字。这些文章的主题之一是为宋彬彬辩护。后来，她们还要求纸质刊物发表她们的文章，未发，因为宋的丈夫不愿意她抛头露面。她的丈夫发现癌症，要等他去世后再发。最近网上报告宋彬彬的丈夫靳剑生因肺癌在去年十一月去世了。同时有消息说，宋彬彬等人将再次发动。

附带指出，在卞仲耘被打死时，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丈夫靳剑生并不是高干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后一直住在美国，年青时曾经和毛在长沙参与学生运动（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国得到毛的接见）。靳剑生的姨妈多次到他插队的内蒙古，说服军代表。靳剑生凭李振翩的关系进入了大学，与宋彬彬同学。

可以庆幸靳剑生的好运气。不过，他应该明白用家庭背景来决定谁能上大学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就像斯维特兰娜虽然享有特权，但是她在书中对苏联将领导人家的保姆厨子都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编制的浪费和没有人情味作了深入的批评。这些显然不能影响到宋彬彬。

二〇〇九年，一些女附中的学生捐款为卞仲耘建造了一座铜像。铜像上没有铭文，只有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原拟“歿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前红卫兵们反对，要求只写“1916—1966”。最后的妥协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的评论家刘自立指出，这是“存像废史”。

斯维特兰娜的书里描述了她和斯大林之间的父女亲情，但是也描述了她知道的对她认识的人的杀戮和迫害。她面对事实，她用善恶标准的普世价值评判事实。这两点正是她的书能感动读者的主要原因。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金钟先生文章的用意，显然是在借他国的精神火光，引导中国的精神前途。希望斯维特兰娜的故事会给中国的国民精神以启示。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 原载《开放》2012 二月号

~~~~~  
【各抒己见】

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 叶维丽 •

作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校学生，我对1966年8月5号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致死一案（“八五事件”）的关注和调查，从2001/02年开始，断断续续有十来年了。主要的研究结果，是2006年用英文发表的一篇学术性文章，该文在网上有经我授权的中文译文（白芳，“卞仲耘之死”，发在www.edubridge.com（二闲堂）“来稿存真”档中/译文省略了原文大量注释）（见本刊zk1005d——编者）。中英文文章的影响均有限。去年以来，《记忆》杂志提供平台，为围绕卞校长之死一案的女附中文革做了几期专辑，我在《记忆》第4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的短文，主要是讨论近年来关于“八五事件”的两个不同叙述或“版本”。按说，要说的话差不多都说了。下面这十条，有些是重复说过的观点，觉得不妨再说一遍，有些是多年来憋着没说的话，有些则是最近看到有关讨论（纸媒和网上的）而新生的感触。拉拉杂杂，没有系统，写着写着，就成了“十全大补”；因为是杂感，表达上也不严谨。但不管怎样，在这些想法的背后，确是一个当年16岁、如今60岁的人，对少年时代身历的一段国家往事的不敢遗忘，是对能有此不易之机会与读者再次交流的珍惜，也是表达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特立独行、勇于直面历史的《记忆》杂志由衷的感激和支持。

在正文之前，我想就自己的“双重身份”讲几句不应算做多余的话。做历史、特别是审视本人亲历的历史事件，无法回避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调查写作“卞仲耘之死”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个史学工作者，同时，我也是一名1966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是广义上“学生斗老师”（王友琴女士语）那代人中的一员。这个双重身份，使我在面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即使“八五事件”发生时我本人并不在场。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尧先生时，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下面的话：“作为女附中学生，我感到有罪”。面对王先生，我恍如见到多年前遇难的卞校长，这时，我就是当年女附中的一名学生，背负着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这样一种逐步获得的自觉帮助我从不同的视角来感受和分析与“八五事件”有关的问题。

一．不能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

做史，切忌做事后诸葛亮，但这又往往是最难避免的。身在历史现场中的人，是无法预知事件会如何发展的。历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无法“还原”，而是尽可能将你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发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这里涉及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建构当年的场景和语境）。文革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和今天已经隔了几个时代。今天的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容易，持有“历史感”难。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所谓“历史感”，其实是当年我们每个人生存须知的常识。

文革中我虽是少年，但也记得当时铺天盖地的“抓叛徒”、“揪特务”、“揭（历史）老底”风潮。我父母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抗日前线山西参加抗战，那时阎锡山领导的二战区，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但阎锡山后来成了“反动派”，我父母的这段历史就成了被审查的重点。文革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发生在每个有点经历的人身上，因为“历史问题”而挨整、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到后来都“一风吹”平反了事。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所谓的“清查历史问题”，其实是在和历史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外调”人员的提问常常令历史当事者啼笑皆非，“清查历史”完全沦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文革后虽然有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但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背后的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的思维方式，并未得到认真反思，而似乎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痼疾。

最近有人指责文革一开始时女附中给校领导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说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最终导致卞校长被打致死。此说令我瞠目结舌。如此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好似拔着自己的头发以求挣脱地球引力，只能将文革研究引向一条通往天方夜谭之路。说到底，无论是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除了北大聂元梓七人之外其他机关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都是大势所趋，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规定动作”，张三不写，李四也会写，和后来发生的暴力没有必然联系。当然，这“张三”或“李四”，一般来讲是当年的革命积极分子。

## 二．文革的再次发动和暴力在其中的地位

我自认为本人在卞校长之死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观点，一是将“八五事件”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政治大背景之中；二是高度重视暴力在这场由最上峰直接发动的“十级政治地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最关注的人物是最高领袖，我关注的是他无人可以取代的、决定性的地位。

1966年七月底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但突然，而且背离了中共指导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规，导致了从中央到北京市、区二级的不知所措，造成包括女附中在内很多基层单位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天下大乱”之效果。此为“文革再次发动”之端倪。（1）领袖放手让学生们“自己解放自己”，暴力的出现就几乎成为必然，对此，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行家们应该比谁都心中有数。刘邓式的工作组，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运动，整干部，整学生，但到底还多少讲究个“度”；此时的文革，则毫无底线了。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经过“再次发动”才真正揭幕，才称得上“史无前例”。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恰恰发生于“再发动”期间，发生在上层政治激烈震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刘公开摊牌）、中层因思想困惑导致不作为以至瘫痪、基层“革命群众”拥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自主权”（需要强调，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革命的）这几条“线”的交点上。它有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为什么伴随着“文革再次发动”，首都北京会出现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群众性“红色恐怖”？放纵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可否应用在这里？暴力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中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1966年“红八月”的血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追问。

我以为，虽然卞仲耘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中学生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但从文革宏观图景来看，她和她之后一大批受难的基层干部教师以及“地富反坏右”并不是此一波（也是第一波）文革暴力的真正威慑对象，威慑她/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的弱者没有意义，她们是祭坛上的牺牲品，借她们的生命来制造一种震慑的氛围。文革这样一场前所未闻、最高领袖自毁执政基础的超大规模政治运动，需要强悍有力的“开场锣鼓”，需要以 shock and awe（震慑）来开道。

当年给北京民众留下极端恐怖印象的“红卫兵小将”，是文革第一波暴力的卖力执行者。多年后我听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说这些青少年是“天桥打场子的”，为文革在中国大地的推进清出了“场子”，造出了声势。过去在北京天桥，一些街头艺人在演出之前，得用一根绳子拴上一块铁块来回抡，吓得人们纷纷闪开，一块场地就被腾了出来，这就叫“打场子”。天桥打场子的艺人们并无意伤害他人，这是与“红卫兵小将”的重要区别。

### 三.“死了就死了”

我最近常常想，对生命的漠视，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当年在我们这代人中相当普遍。这漠视不仅表现在八五当天暴力的肆意横行，也表现在卞仲耘倒下后，屎尿失禁，生命垂危，被像弃物一样放在一辆手推车上，很长时间无人理睬，尽管医院离学校近在咫尺。而卞死后一些学生的反应也表露了冷血和漠视。在医院里，有人要求医生解剖尸体，以证明卞本来就有病，死因与暴力折磨无关。第二天，卞死亡的消息由一位党员学生向全校通告。在我看来，这个死亡通告的关键，是“死了就死了”五个字，它为卞之死定了调子。这个说法出自一位市级领导，是对文革以来北京市第一起死于非命恶性事件的官方表态，这个表态后面有文革再次发动的大背景。

“死了就死了”也正是卞身后的遭遇。听到卞死的广播通告后，女附中没有一个班级或个人公开表示哀悼，有的学生居然鼓掌。只有一位教师给卞家属写了悼念信，但她既不敢署名，也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实笔迹。此后，有学生造访卞仲耘家，但她们不是去慰问，而是去向卞丈夫了解女附中情况，以便深入开展文革。

1966年八月上中旬北京中学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卞仲耘的死亡很快就被其他事件遮盖过去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城区的风起云涌。这时，有谁还想着刚刚惨死的卞校长？有谁还关心另外几位也遭到严重摧残的校领导？其中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几个星期不能下地。当卞仲耘的家人去给死者火化时，他们须经过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北京城区。王晶尧先生说，他哀伤的心情和四周亢奋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他终生难忘。

八月五日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那天之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之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手的人是少数，但对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

十年前第一次去看望王晶尧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漠的人群中有我。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姑且只说我们这代人）。它的背后有深层的原因，渊远流

长。省思，是大家的事情。

#### 四．软弱无力的“政策派”

我对“八五事件”的研究重心，围绕着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等问题，而对1966年6月初工作组进校以来形成的、包括宋彬彬在内、我称之为“骨干学生群体”的若干人，并未多费笔墨。（2）理由很简单，她们既不是“八五事件”的发起者，也没有参与暴力。（但在对生命漠视这点上，她们有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个基本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个当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会承认的。

但我注意到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文化等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公众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宋彬彬个人身上，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诸如“宋彬彬打没打人，她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坦白地讲，如果纯粹从历史事实出发，我可以不理睬这个“公众热点”。但一个人“热”了四十几年，在我们这代人中，大概算是绝无仅有了，这个现象就颇值得琢磨了。

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下面简称《好故事》）一文中，我谈到宋彬彬在文革初期、包括“八五事件”的女附中运动中并没有引人瞩目的个人行为，她是“骨干学生群体”的一员，她的名字常常和刘进连在一起，而且是在刘进之后（刘为工作组进校后成立的师生代表会主席及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第一把手）。宋的“爆得大名”是因为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袖章，因此而成为尽人皆知的“首席”红卫兵，并因“宋要武”一名而被符号化、妖魔化。接着就有人把她说成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而因此要对“八五事件”负责。我在《好故事》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个叙述逻辑犯了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八·五）的错误，这是做历史的人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分析刘进、宋彬彬等人当时的思想脉络，觉得她们属于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制定的中央“八条”影响下的“政策派”，这一派主张“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文革。七月下旬后，派遣工作组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一突变的形势使得中央和北京市一级的“老革命”都不知所措了，遑论刘、宋这样的青年学生。

八月初的她们，既困惑，又要努力跟上“革命”；而做为工作组时期的“红人”，她们的身份尴尬，已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工作组撤离后的“革命”，已不兴讲“领导”、讲“秩序”了，兴的是“自己解放自己”。八月五号暴力在校园爆发，她们在进行劝阻时说，“斗黑帮可以，不要打人”。这样说，是符合她们的思想逻辑的。这个逻辑，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大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讲政策”，特别是在最高领袖明令抛开政策（毛在恰恰在八月五号那天废除了讲政策的中发“第九号”文件）时还讲什么政策，只能是软弱的，无力的，无效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中死于非命的很多事件后面，都存在这么一个“政策瘫痪”的背景。彼时，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在当代中国的历次运动中，从“土改”，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有“政策派”这么一路。好好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遭遇起伏，是很有意思的。

再补充一点，要让刘进、宋彬彬这样具有相当“正统”思想的人，在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率先成立红卫兵，是不符合她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脉络的。

邓小平在1966年七月初接见包括她们两人在内的女附中文革班子时，明确反对成立红卫兵一类学生造反组织，要求尽快恢复党团活动，这对她们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红卫兵的态度

度有很大影响。近年来，有关宋彬彬是女附中成立于7月31号的红卫兵之首领的说法，广为流行，而此说奠定了宋彬彬应对八五事件负责的前提。（3）这个前提，既没有外在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刘、宋等人的内在思想。

## 五. 血统论、“干部子弟”和“官二代”

在《好故事》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宋彬彬 / 宋要武”是如何成为文革“神话”（myth）的，我认为该神话的长盛不衰，其实是反映了多年来人们持续的心理需要。

关于“宋要武”神话，我最近又有一点新想法。我感到这个神话背后的重要支撑，除了“宋要武”具有的强大符号象征力量外，还涉及到一个人人心中所有、但往往口中所无的中国社会等级现实。如果宋彬彬没有高干子女的家庭背景，纵使她在八·一八给毛主席戴了红卫兵袖章，公众对她的兴趣还会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吗？有时候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更加深刻的。1966年7月底横空出世的“对联”及其背后的血统论，虽经包括遇罗克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犀利的剖析和批判，但有些更深层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北京文革初期红卫兵的主体是“干部子弟”。我在几年前的一本小书中写到：“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制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人追求的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一套在中共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的问题？”（4）我是“营垒中人”，这段话可以算做我的反躬自问。

1949年后由主张社会平等的政党建构的等级社会，到了今天有变本加厉的演进。如果说当年的干部子弟中还有一些人以艰苦朴素为荣，今天“官二代”中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因为家庭背景，宋彬彬怕是承受着几十年来社会上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深的不满。我以为，“宋要武神话”生命力的一部分即由此而来，舆论对宋彬彬本人缺乏同情也与之有关，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当代社会政治原因。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我有关“八五事件”分析的反应，也往往不注意我自己看重的观点，而一言以蔽之曰“为宋彬彬辩护”、“为红卫兵鸣冤”。我满心想再说一遍，“请认真读一下我署名白芳的文章，看看我到底说了什么，”但再一想，如何解读“八五事件”，在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不要太书生气了；“当下绑架历史”是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因此，我虽然恪守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厘清应该厘清的事实，却对“宋要武神话”的消弭不抱幻想。我想它会成为一个文革传说而流传下去。毕竟，它是一个如此饱满的好故事。

## 六. 宋彬彬和“宋要武”

我因为调查“八五事件”，通过刘进认识了宋彬彬，并对她进行过几次采访。在一次有关活动结束后，宋彬彬骑上自行车在寒风中离去。我身旁一位同学说，街上行人有谁会想到这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老妇人，就是当年很多人谈虎色变的“宋要武”啊。我不禁想，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宋彬彬”。

一个是那个骑车远去的宋彬彬，我对她已有所了解。她性情温和，不善言辞，在人群中不抢话、不冒尖，遇事也不是总有主张，平凡得几乎令人失望。在几次访谈中，我感到她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对我讲（关于她1966年秋天的武汉之行，她就是一点点地讲出来的）。不讲的原因，倒不是为了自我保护，而是为了保护他人和维护老一辈的正面形象，尽管她自己因为“不讲”而受到多年的曲解和栽赃。我并不认同她这样做的政治理由，但从她的做法中，我还是看到了她为人的厚道。



另一个宋彬彬，更确切地说，“宋要武”，是个符号，不是真人。在一些人的笔下，她欠着六、七条人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像很多人一样，我曾经不相信宋彬彬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领袖赐名，是何等的荣光，受宠若惊还来不及，谁会那么不识抬举？

但经过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查证，我接受了宋彬彬本人的说法：她从来没有叫过“宋要武”。“宋要武”的名字是《光明日报》一位记者紧接着八·一八领袖一句“要武嘛”之后造出来的，它的出现那么合乎那个时代的情理，立即被几乎是宋彬彬之外的所有国人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伟大领袖，而是全国人民给宋彬彬改了名，其中不排除许多人与有荣焉的心理。

八·一八后，我们学校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写给宋要武的信件，因为长期没人拆看，都在传达室里堆着。一位同学出于好奇，打开了其中的一些来看。多年后她回忆，说来信不外两个内容，一是向“宋要武”致敬，二是向“宋要武”汇报当地文革情况。这些人需要“宋要武”的存在，他们也参与了“宋要武”的制造。

几乎就在人造的“宋要武”出现的同时，红色恐怖席卷北京城，“要武”在霎时间化为成千上万臂戴红袖章“革命小将”的行动。八·一八是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个令很多人想起仍然心悸的日子，是大规模“红色恐怖”的开幕式。在很多如惊弓之鸟的百姓心中，“宋要武”——“红卫兵”——“暴力”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逻辑链条。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从心底不能原谅“宋要武”，不能原谅“她的”红卫兵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用我听到过的一个的说法，宋彬彬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作为一个符号，“宋要武”有着太强大的象征力量，真实的宋彬彬在它的面前苍白无力。

湖北省委在1966年9月初请宋彬彬去武汉。他们请的是“宋要武”，不是宋彬彬。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无视宋彬彬本人的意愿，坚持以“宋要武”的名义发表保湖北省委的公开信。“宋要武”成了一根省委打压他人的棍子。很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反对湖北省委的一派开始制造宋要武打死多人的谣言，以此来抹黑对方。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在大串联的途中在武汉或者长沙看到这样一份传单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谣造得太离谱。但不管怎样，在反对派的眼里，“宋要武”名字本身即授人以柄。叫的是“要武”，她不杀人谁杀人？

北京制造的“宋要武”，转了一圈从外地回京后，已经成了血债累累、人人喊打的凶手。可以写一篇“宋要武诞生记”，会是绝佳的黑色幽默，或者写一篇“四十余年来宋要武对宋彬彬的骚扰”。

只有宋彬彬本人知道这个骚扰是什么滋味。

具体的真实无法抗衡象征的强大，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荒诞的现实。“假做真时真亦假”，一个文学家可能比一个历史学者更能应付现实的荒诞。

但我还是要问：具体的、真实的、活一岁老一岁的宋彬彬和“宋要武”是什么关系？她应当对人造的、她本人从未接受过的“宋要武”及以“宋要武”名义造成的恶劣后果承担责任吗？这些问题，文学家可以不问，但做历史的不能不问。

七. “偶然”与“必然”，“规定”与“自选”

宋彬彬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是她在历史上的“定格”。在短暂的风光后，八·一八成为当时只有19岁的宋彬彬挥之不去、笼罩了她一辈子的阴影，成为她四十几年来背负的一座无形的十字架，成为她生命中一道深深的刻痕。

而这一切在开始时，却似乎充满“偶然”。

现在我们知道，八·一八那天把“革命小将”请上天安门城楼，是“上面”临时做出的决定。（5）据刘进回忆，女附中有40个名额（当时不知道是上天安门城楼），她决定自己不去，让宋彬彬带队去。当时的刘进，是学校筹委会的“一把手”，也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女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宋彬彬应该算是刘进的“左膀右臂”。

如果我的看法不错，女附中“红卫兵”（不包括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卫兵组织）对“红卫兵运动”最大也是唯一的“贡献”，就是在窄窄的红布条上描上“红卫兵”几个字，字是从不同的地方收集的毛泽东手迹。从8·18当天的纪录片上看，当时各校红卫兵戴袖章的并不普遍，上面有字的就更少。袖章上带有毛泽东手书“红卫兵”字样，很可能是女附中的发明。（自从宋彬彬给毛戴上袖章，带字袖章即广为流行。）有女附中同学回忆在八·一八之前赶制带字袖章，说做出来的数量有限。宋彬彬说，她临上天安门前，有人特地把带字的袖章换给她戴上。点明这一细节，是因为袖章这个“道具”对宋彬彬很重要，而这个道具的存在有偶然性，就像刘进本来可以决定由她自己带队去天安门，而让宋彬彬留守广场一样带有偶然性。

不只一个人回忆当时天安门城楼上有多乱，“小将们”在党政军领导人中间串来串去，场面相当失控。据宋彬彬回忆，其他中央领导大多已经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但谁去给伟大领袖戴袖章却要更加慎重，连小将们也知道这个问题需要请示。人群中有个男生推了宋彬彬一把，说，“你上”。这个男生还说了一句：你的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给毛主席献上？请示的对象——一位中央部门的负责人，恰恰对宋彬彬的家庭背景知根知底——他认识这个孩子。这里，是宋彬彬而不是随便某一个在场的红卫兵给毛主席戴袖章就不能全说是偶然的了。“政治审查”即使在紧急时刻也不能少，而这时“脸熟”很重要。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在亢奋、混乱的氛围中。城楼下，是一片喧嚣的红色海洋和无数只挥动着的手臂，数十万人含着热泪高呼领袖万岁，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白热化，没人能说清此时此刻中国首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政治集会还是宗教盛典。在这一特定的场景中，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袖章。据宋彬彬说，戴袖章时她很有些紧张，生怕别针扎了伟大领袖。毛泽东那天穿的是军装，这是他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人之举，也是他文革“再次发动”以来一系列戏剧性举动之一。给高调支持红卫兵的“红司令”戴上红卫兵袖章是那个时刻的应有之义，是那个历史场景中的“规定动作”，而非任何个人的“自选动作”。

这个动作由宋彬彬而不是别人来完成，说来颇为偶然，不知多少人对她羡慕死也。宋彬彬的名字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宋彬彬因此而成为红卫兵的“脸”。其实风头本该由北大附中彭小蒙出的。被“江青阿姨”视为“小太阳”的是她，八·一八那天被指定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她。结果大家把发言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只记住了给领袖戴袖章的，这对彭小蒙不够公平。无论讲“造反”的经历，还是讲引领时代潮流的精神（这个潮流包括语言、行为、“做派”、服装、发式等等），北大附中“红旗”的领袖彭小蒙都远远比宋彬彬更有资格代表当时的红卫兵。让既无突出个人表现又讲不清楚自己哪天成了红卫兵的宋彬彬代表红卫兵，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但自从有了“宋要武”，宋彬彬不代表红卫兵，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历史不但充满偶然，也不断制造误会。

## 八．红卫兵历史是一笔糊涂账

这里的“红卫兵”，特指1966年初夏开始在北京中学生中出现的青少年团体。八月初，他们由伟大领袖引领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而非自己“登上”的舞台）。到了这年冬天，他们成为风光不再的“老红卫兵”。

我在做“八五事件”调查时，对女附中红卫兵历史做了一些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女附中曾出现过的两个红卫兵群体，对其中被简单称作“红卫兵”（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基本历史，当事者语焉不详。比如说，“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子，有无纲领，成员加入有无程序，等等，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女附中红卫兵历史是一笔糊涂账。

我本人当过“红卫兵”，是个“小萝卜头儿”。从我以为能说清这些问题的当年红卫兵负责人那里得不到答案，我只好反过来问自己：我是怎么当上红卫兵的？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认为自己能当，也没人质疑，我就是了。有个组织吗？好像没有，就是有时和班上一些也自认为是红卫兵的同学呆在一起。但不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去学校，也没人管。谁是我们的“头儿”？班上有几个比较“厉害”的人物，但她们是头儿吗？好像也不明确。问问其他一些人，感受也很近似。

有一天我恍然，原来女附中的“红卫兵”是在得知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之后的某一天“一轰而起”的。听起来是个“组织”，但因为是在领袖已经开口支持、大家急忙赶风潮的“大拨轰”形势下出现的，已经没人记得它出现的时间，也没有成立的仪式。和最早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同，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北京城区学校红卫兵并非自发，也毫无风险。当时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家庭出身，能否当上红卫兵，全凭家庭，和本人表现无关。这也不同于初期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因为共同的理念走到一起的，并不特以家庭出身划分人，成员中包括少数“非红五类”同学。

在我心目中，学校里红卫兵的“头头”是刘进、宋彬彬等人，但多年后得知，刘、宋二位早在八月十九号就不再担任学校文革领导职务，而我一无所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松散的情况。因为种种原因，我比较早就不想在红卫兵里混了，但“加入”没个程序，“退出”也不用和任何人打招呼，心里想着我不是（红卫兵）了，我就不是了。人们往往忘记，对相当多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个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没人管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这个阶段各个学校的红卫兵有着严密的组织，不如说它往往是由一伙伙“革干子弟”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八一八林彪亲自号令“破四旧”之后，杀向社会，上下直接联手，搅得周天寒彻，使北京一度成为一座在最高当局认可之下的血腥恐怖之城。这个现象，在中外历史上怕不多见，后人很难想象。

回到女附中“红卫兵”：在那样一个大形势下，它一笔糊涂账的状况并不奇怪。但从清华附中“红卫兵”5月底成立，到“西纠”8月下旬、9月份的一系列“通令”，到“老红卫兵”阶段的“联动”，这中间值得探究、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还很多。据我所知，近年来当事者们已经开始写回忆，但扑朔迷离的地方仍有不少。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中“糊涂账”比比皆是。一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其实对历史的态度十分马虎、非常实用。

我在此呼吁红卫兵历史的当事人都来写写回忆录，我们这代人已经到了写回忆录的年纪。我猜测，很多人不说或不写与红卫兵被彻底妖魔化有关。今天，红卫兵在世人眼中，几乎等同暴力。我本人也认为，血统论与暴力是这一阶段红卫兵最重要的两大特征。但深入去想，我认为可以对这一阶段红卫兵做进一步分析，至少可以大致区分出“精英红卫兵”与“普通红卫兵”、

“政策策略”型红卫兵与“鲁莽暴力”型红卫兵几类；此外，城区（西城、东城）红卫兵和郊区（海淀区）红卫兵也有所不同。

早在“红八月”开始之初，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发过紧急呼吁书，反对暴力和过激行为，这些人应属于“精英”加“政策策略”型红卫兵。同属于这个范畴的，还有发布了一系列通令的“西纠上层”，他们在“红色恐怖”最猖獗的八月下旬（此时公安警察已被明令不许干预“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企图“以兵制兵”，遏制住暴力的狂潮。一度，偌大的京城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一批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维持秩序的。对这段离奇的历史，尚无学者做认真探究。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是“造反有理”的最早鼓吹者，而一旦人们起来“造反”，便没人能控制它表现的方式了，这恐怕令反对暴力的精英们感到尴尬。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1966年八月下旬成立的西纠，则带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蛮横霸道之气，与反动腐朽的血统论有不解之缘。西纠虽然在若干个“通令”中呼吁反对暴力，但自己并没有严格执行。我本人对西纠在“遣返黑五类”中的作为，就有很多疑问。加之以西纠名义活动的人品很杂，其中有因施暴而恶名昭彰的。这些都使得全盘否定西纠十分容易，很得人心。

但红卫兵不是铁板一块。在当年那种非常时期站出来反对和企图制止暴力的红卫兵，和手抡皮带草菅人命的红卫兵还是不能等同，不应放进一口锅里煮，虽然即使是“政策策略”型红卫兵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再进一步说，当年的历史，上层和下层交织，纷纭诡异复杂，“水”不但浑而且深，很多事情还不那么清晰。所谓“糊涂账”，也包含这一层意思。

四十多年过去了，要区分不同种类的红卫兵有什么意义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想，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仅只有黑白两色。在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才有说服力，才是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

提出对红卫兵要有所区分，是件担风险的事。我深知以我的“家庭出身”，极易被人攻讦，我这是将自己送到喜爱贴标签扣帽子的朋友们门上了。但这些年来做“八五事件”的经历让我明白，在当代中国做信史，就得准备挨骂。对我来说，这是历练。

## 九．教育者的责任

在最近关于当年打过人的红卫兵给老师道歉的讨论中，有人提到教育者的责任，这是我多年来欲说还休的问题，今天索性将它和盘托出。

首先要说明的是，教育者们，不管是老师，还是校领导，都是当年教育路线的执行人，而非始作俑者，审视他们的责任，应该也只能在这个框架之下，这是需要十分强调的。

回到1966年女附中“八五”事件的现场：斗争校领导的动议，是高一年级某班一些干部子女最先提出的，当时革命是要有“出身”做资格的。而文革前，这些学生曾经和全校其他干部子弟坐在一道，在礼堂听校领导告诉她们：你们的担子比一般人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这是一次专门为干部子弟召开的大会，我也在场。

换句话说，八五那天斗争校领导最活跃的一批人，是曾经被校领导视作对革命事业有特殊责任的人。当然，不仅仅是校领导，社会的四面八方都对出身“干部家庭”的革命“骄子”们表达了同样的期许。这是文革前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受到“革命文化”熏陶的，不只是出身“红色家庭”的人，而是全体学生。据目击者说，八五那天参与暴力行动、上手打人的不仅有干部子弟，也有少数非“红五类”出身的。一时间，

“你一下，我一下”，是个“群情激愤”的场面。但我坚信，施暴的骨干，非干部子弟莫属。

眼前的悲剧所以悲，不仅在于它导致了卞校长的最终死亡和给其他四位校领导带来终生的肉体和心理创伤，而且在于它充满了讽刺和悖论：这些女学生相信她们的所作所为是“革命行动”。我的记忆里，从1964年以来，在“阶级斗争”之弦越拧越紧的大形势下，学校政治教育的基调是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是校领导，还是班主任老师，都是按照这个基调教导学生的。这使得文革开始后出现的“学生打老师”具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在我看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具有相当程度的“表演”性质（performance）。文革提供了“舞台”，但对我们“角色”的培养，并非自文革始。

我后来得知，女附中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卞仲耘和胡志涛，因为八月四号下午挨了莫名毒打而上告无门，八五那天离家去学校时，是做了“最坏的准备”的，说是去赴死也可以。平时衣着极为朴素的她俩，那天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漂亮。

但不是死在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手里，死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而是死在自己学生手里？！卞校长，您当时想到这有多荒唐吗？

据在场的同学回忆，卞校长那天穿的是一件绸质短衫。那件衣服后来浸透了鲜血，皱成一团。胡校长穿的一条做工精致的黑色长裙，被从下摆一直撕到胯部；她穿的浅色短袖衣，被拨满了墨汁，变成黑色。

卞校长去世后，胡校长成了学校“头号走资派”，我不只一次看到她在校园里受到一些低年级学生的围攻辱骂。她总是昂着头，挺着胸，大气凛然。我们很多人都暗中钦佩她。多年后我才知道，自从八五挨打后，她的腰必须靠金属支架来支撑。

胡校长于1995年去世。据王友琴同学说，胡校长生前接到一封学生的道歉信，对八五那天她参与打人道歉。她是多年来唯一向胡校长道歉的人，她的信没有署名。胡校长表示，她原谅所有打过她的学生。

最近，读到《读书》杂志创始人范用先生的遗嘱。范用先生和胡校长同属一代人。遗嘱写到，“我……一生……说过不少错话，办了不少蠢事。生于今世，很难有人能够逃脱这种历史的嘲弄……讳过饰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6）“历史的嘲弄”几个字引起我的注意。

对教育者的责任问题多年来我欲说还休，因为实在不忍。文革爆发后，她／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我现在想，以胡校长的通透睿智，以她对教育事业的忠贞不二，以她一生坎坷的老革命经历，她一定也反复问过自己，当年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革命”出了什么毛病？

十．道歉还是不道歉，这是个问题

最近因为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向老师道歉，引起人们对当年打过人的学生对老师道歉的关注。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听说一些道歉的事情，包括对曾经被伤害的同学道歉，可见与文革有关的道歉并不是一件刚刚开始做的事。但学生向老师道歉的消息仍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打老师”并非个别现象，连小学生都有干的，而今天公开出面道歉的人太少了，“物以稀为贵”。

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上手打人、动嘴骂人的，不是一个、二个，三个、五个，也不只

涉及一、二个班级。但至今我们知道的、因当天参与暴力活动（包括语言暴力）而道歉的，只有不知姓名的一个人。

由于卞仲耘之死已成为恶名昭著的文革暴力案例，有人出于义愤，把女附中文革开始时所有在校生的名单贴在网上，指出“凶手”就在里面，借此形成舆论压力。

这个做法并没奏效，没有人因此而站出来。

有个叫哈里斯的美国人，据说是学法律出身的前检察官，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办案”，企图找到“杀害卞仲耘的凶手”。看来他效仿的是战后西方人士四处捉拿纳粹罪犯归案的榜样。但到最后不了了之。

即使如此，要找出杀害卞仲耘“真凶”的呼声至今未断。

所有这些的背后有个假设，即存在一个或几个不仅有杀人动机、而且在行为上直接导致卞仲耘死亡的凶犯。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八五”事件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罪责明确的凶手。

在《好故事》一文中，我曾针对哈里斯先生说：“我不认为卞仲耘之死的惨剧是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别是应用于由最高领袖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谁是‘凶手’？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

在“红色恐怖”猖獗的1966年8月，多所北京中学出现学生打死校长和教师的事件。到今天，没听说哪所学校有人站出来承认参与过此类恶性暴力，更不要说承担打死人的责任。“凶手”阙如是个普遍现象，不只女附中一家。因为普遍，所以值得问一个为什么。仅仅从道德的角度不能解释这个令人悲哀和失望的状况，它后面有更深层的原因。简而言之，怎能轻描淡写地放过最上峰在暴力问题上怂恿放纵的责任，而一味责难受到鼓励教唆去“砸烂旧世界”的青少年呢？更何况这些青少年在文革开始前受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崇尚暴力革命的教育。

如此，我们面临一个历史的难题：在没有厘清上层责任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完全不谈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实在是一个困扰了我们这代人几十年的问题。或清晰，或含混，我在不同场合听到不同的人在议论。一个伤害过他人的人如是说，我那时才16岁，是响应号召……

原北京外语学校那些曾经打骂过老师的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选择了向老师道歉。他们的行为，令受过伤害的老师们深感欣慰，也得到了社会上普遍的赞许。

道歉还是不道歉，这是个问题。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和语境去看，涉及诸多层面。要让当年的青少年担起全部的历史责任，对他/她们是不能承受之重。“推诿”的做法有它的道理，甚至“有情可原”。

但毕竟，即使在那个癫狂的时代，再怎么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选择空间。做什么，怎么做，还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心灵和大脑。有人下得去手，有人下不去手，有人呐喊助威，有人悄然离去，这中间，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每个人的“心性”。在八月五号的女附中，“心性”的微妙差别没有改变卞校长最终死亡的命运。但“心性”可以全不算数吗？

勇于道歉的人，承担的是个人良知的责任。我一直认为，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于道德，但在这里，感动我们的确实关乎道德，关乎人之为人的羞耻之心、向善之心。唯其稀少，尤足珍贵。

作为“学生斗老师”那代人中的一员，我为同辈人的道歉所感动；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不会因此而放弃对文革始作俑者的追究。

2011年6月修改

1. 我对这一时间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动乱的年代》的启发，该书于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有关我对她们在“八五事件”中的看法，请看“白芳”文及《记忆》47期。
3.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
4.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2008，第106页。
5. 张辉灿口述：《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第17—23页。
6. 《追思范用》，载《读书》2010第10期，第4页。

~~~~~

【口述历史】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 王宇 • 侯瑛 • 李红旗口述，卜伟华 • 米鹤都采写、编辑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海外版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第一册之三，该书《编者的话》见本刊zk1102c：<http://museums.cnd.org/CR/ZK11/cr619.gb.html#1>〕

王宇，辽宁海城人，1946年出生于齐齐哈尔。文革前是北京第28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28中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文革中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文革初期，王宇等先后成立了28中“红旗”和“八一八红卫兵”，为其负责人，也曾参与过“破四旧”、抄家。1967年4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分裂成“四三派”、“四四派”以后，28中“八一八”红卫兵是北京“四三派”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之一。1968年1月19日，王宇被军训团当作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被批斗。1969年5月随父亲到河南息县铁道部“五七干校”。后进入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当工人，现已退休。

侯瑛、李红旗文革前均为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的骨干。

◇ 文革前平淡无奇

我是辽宁海城人，1946年6月29日出生在齐齐哈尔。我父亲叫王福恒，原来在哈尔

滨当铁路工人，是火车司机。日本投降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党，当了干部。他就在“毛泽东号”机车组那个单位，当过副段长，后来，他在哈尔滨铁路局当了总务科科长。我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

1953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铁路上急需人才，把我父亲从哈尔滨调到北京来了，在铁道部搞信访工作。他一直到去世，除了个别时期，基本上一直搞信访，还在监察局干过一段时间。他一直没退休，在66岁的时候去世。我们家有不少亲戚都在东北铁路上工作，各个地方都有，可以说是铁路世家。

到北京后，我上的是铁路第七小学。这个学校那年刚成立，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是它的第一届一年级学生。铁七小当时在北京是所非常好的学校。因为铁道部特别重视这个学校，投资很大，当时铁七小是跟史家胡同小学齐名的好学校。文化大革命以后，铁七小衰落了，现在据说和另一个小学合并了。

我的初中是在铁二中上的，也是在我家附近。铁二中原来不错，是铁道部的重点，教师都是一些很出色的人才。铁二中的学生因为家里都是铁路上的，为人都比较正统，比较老实，做什么事都讲规矩。文革中，铁二中的“老兵”、“四三派”、“四四派”的头头都是我原来的同学，而且跟我关系一直都特别好。

后来我高中上的是28中。我考高中那年，铁二中当时招生考本校的可以优先考虑，但我第一志愿报的是13中，第二志愿才报的铁二中，我的平均分是93分，结果铁二中没要我，我落到了28中。28中比铁二中之要差一点，当年在北京还可以算是中等偏上一点点的学校。

28中全校有2000多学生，初中每个年级有10个班，高中每个年级有4个班。我们学校的原址据说从前是清朝升平署。道光年间设立的，主持清朝皇宫内演出事务。后来升平署的剧本、档案、戏衣、道具、剧照等都保存到故宫博物院去了。学校前身据说是庚子赔款后美国人办的学校，当时有汇文中学、义文中学，28中就是当年的义文中学。我们老师讲，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28中都是先锋，都是最早参加的，因为离天安门近。“一二·九”运动时共产党经常在这边活动，秘密接头。所以，28中不光资格特别老，而且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到高二以后，可以说已经是绝对拔尖了。就是说，我想考多少分就能考多少分。那时最高分一般是120分，多一道题。有一次考化学，我哗哗写完就走了。我写字一向特别糟糕，有的字老师都不认得，结果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跟老师吵了一架，回去就把化学书全背下来了。第二回考试又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就跟老师说，我的答案就是根据化学教科书第几章第几节，在第几页第几行。老师一看没办法，就说，好了，我给你80分吧。

上高中以后，我的眼睛近视了。可我不爱戴眼镜，又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也不怎么管我。我上学时，把一只钢笔往口袋一插就上学了，那些课本就放在抽屉里。老师讲课时，我就学习下一节课的内容，我自己学。学了一会儿以后我就开始做作业了，当天预留的，和可能预留的作业我都做了，而且往多了做。下午我就看课外书。我当时老去西城区图书馆借书来看。我是下课就打球、游泳、玩儿，上课我就看自己的课外书。我的课外书挺多，看的挺杂。

我人缘挺好，因为平常老打球，玩儿啊，学校里认识的人挺多。我上学每天正点到达，放学了我就跑了，在学校里不怎么呆。我有功夫就玩儿去，打篮球、打台球，到玉渊潭游泳，夏天整天就泡在那儿了，下课铃一响，我就奔玉渊潭了。这样，我们班的女同学里，好多我可不

上名字，除了必要的情况，我跟女同学一般不大说话。

我在中学不大求“进步”，没担任过什么班干部，最多就是当过化学课代表。中学也没有入团，还差点被打成右派学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右派学生，但是没有带帽子。那是高一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跟学校的教导主任吵了一架，在几个人中，我的态度最强硬。结果学校闹得挺厉害，差一点把我打成右派学生。因为这个事，我还跑到教育部去告状。到了教育部的信访室，人家问我，你家里干什么的。我说是铁道部信访办的，结果教育部的人和我爹认识，都是国务院部委搞信访工作的同行，平时开会也有交流。他们赶紧给我爹打了一个电话。也许因为这个，我们的事后来学校也不了了之了，没给我们处分。我们的教导主任姓张，文化革命后，他还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拿出自己做的醉枣招待我们。他说，王宇啊，文革那时候我就怕你整我啊！我说，哪能呢，我不会计较那个事。

◇ 仗义执言引火上身

我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高考复习的时候，我把福建编的、浙江编的十年高考试题全部做完了。我还把苏联的那个十年高考试题做了一遍。到文化革命前夕的时候，考大学的准备都已经做完了。我已经不复习功课了，开始玩了，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也分成“反”党支部的和“保”党支部的两派。学校里大多数学生是保的，保的呢一般都是学生干部。反的呢，其实一般也就是小孩们觉得好玩，当时反的这帮人也就是提意见，并不是真要反对和打倒党支部，绝对不是。

有一次，一些学生跑到校长室那里，在那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么做的结果就引起另一部分学生的反感。我本来没有想参加哪一派，属于那种感觉好玩的。当时我也没有写大字报，不过我是支持反校党支部那一派的。当时，我们班几个同学起来给党支部写了大字报，结果受到许多攻击。我就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我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允许人家发表意见。实际上我只是仗义执言，谁知这一来呢，就把矛头都指向我了。

可没几天，大约在6月20号左右，上面派的工作组来了。工作组一到，就说我们学校党支部是错误的，有问题。于是，形势马上就翻过来了。工作组进校之后，好像很民主，每个班要出一个革命学生代表，然后这些人呢，就是围绕工作组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结果在学生们选校文革的代表时，把我选成革命学生代表了。那时候学校里还没有成立什么组织。

在工作组进校的前后，我们学校高二有三个学生，有一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激进的口号，大概也是从社会听来的。工作组进校之后呢，就先拿他们开刀，认为他们是反动学生。我们这些人认为这些学生过激了，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即使他们不对，我认为也不能这样对待学生。工作组一斗争这几个人，就激起民愤了。

我是高三的学生，比较显眼。我一出来说话，结果这矛头就又对准我了。我不服气啊，当时就顶起来了。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确实没有组织。当时已经有那种意思，说要抓右派分子了。心里也有点儿寒，因为我是高三的嘛，毕竟跟初中学生不一样，对“右派”这个词还略微知道一些的。不过，工作组当时抓右派，但对我下不了手，因为支持我的人多。工作组于是布置了一批人写大字报，大字报写道：要“揭开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王宇的画皮”。同时，他们就召开了一次大会，那时工作组也就是进校后十多天的样子。可就这一个大会，工作组等于把自己搞垮了，他们在学生中的威信一下就降低了，很快，随着大形势的变换，工作组就失去了领导权了。

◇ 侯瑛谈“红旗”的成立

侯瑛插话（王宇的同学，28中八一八红卫兵的主要首领之一）：我觉得文革初期，工作组到28中以后，什么事也没干，就是围绕着高二几个学生的事，后来再加上王宇的事，天天辩论。辩论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会，自己班里也在辩论。比如说王宇他们班辩论吧，我们班就会去好些人。而且还是两拨人，有拥护他的，有反对他的。当时学校里的这种辩论会，民主气氛倒是特别浓厚，随便谁都可以组织一个会，畅所欲言，非常好。我觉得中国就需要这种民主气氛。

当时有件事特别有意思。28中有两个青年老师，一个姓吴，一个姓韩，有天晚上他们俩聊天，可能说了点什么。后来被人揭出来，给他们整了个“吴韩夜话”。结果也是天天批斗。

我感觉，本来工作组来，应当是斗走资派啊，什么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啊，结果都没有关系，就整这点烂事。瞎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工作组就撤了。可是在我们学校就形成了两派人，实际上是三派。一派呢，就是原来倾向保学校党支部的，倾向工作组的这派人；还有一派人呢，就是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的，经过那一个多月的陶冶，学生们就开始联合起来了，观点一致的就走到一起了。当然还有一派人，是什么都不过问的一批人，也就是后来说的逍遥派。

我们学校在8月份成立了三个红卫兵组织。

我记得工作组撤走的第二天，海淀师院附中的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串联。因为我们学校好几个人的哥哥姐姐都在师院附中，是红卫兵，联系也比较密切。于是这些同学就把他们的哥哥姐姐领到了我们学校。另外六中红卫兵也来了几个人，但是没表态支持谁。8月1号前后，开了成立大会，28中在海淀那帮人帮助下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

没几天，28中成立了第二个组织，叫“红旗”。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叫任七一的女生，她和王宇成立的“红旗”。他们成立“红旗”的意义，我当时认为就是冲击第一个红卫兵，对红卫兵不满意，说他们是“保”字号的，根本就违背了红卫兵原来造反的意义，就是说他跟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本就不是一类的组织。红旗的那个《宣言》是我写的，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再以后，因为“红旗”打人的事，王宇他们不满意。他当时规定就是，谁再打人就开除谁，就是不许打人，但还是制止不住。于是在八月下旬，王宇就又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

◇ “八一八”诞生的红卫兵

王宇：六中大约在6月份，就成立红卫兵了，在北京市算是很早的。他们和我们是一墙之隔，两个学校一直关系密切。六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跟我关系都很好，找我串联过。但我觉得他们太激进了。他们要搞大革命，要建立什么毛泽东城，要把北京改名字等等。我对这些就特别反感。我说，不是反对个人崇拜嘛，毛主席自己都没提这些，咱们这样做不合适。我的思想一开始就不激进，到现在，我的思想也不激进。

在师院附中那帮人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就成立起来了。28中的红卫兵大约有百八十人，大多是干部子弟。他们这些人在学校里大多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调皮捣蛋的，也没有什么威望。另外呢，红卫兵这些人哪，我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他们。一开始呢，他们保学校党支部，接着又保工作组，到后来工作组倒台了，他们才起来反对。而且，他们反对时的观点比起原来反党支部、反工作组的同学还要激进得多。我就不喜欢这种反反复复的，出风头式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错了 I 公开承认，我再改。不要说我原来是对的，我现在还是对的，我永

远是对的，那不可能的。何况这些人在学校里本来也不是什么有威望的人，他们后来在学校打老师、干部，我看见他们把图书馆的书拿来烧，红红的，一米高的火苗，还让老师从这火堆上面打滚，滚过去。

因为和红卫兵有分歧，所以我跟任七一成立了“红旗”。“红旗”的人数比红卫兵少一些，刚成立的时候也就二三十人。“红旗”的组成人员出身也好，大多是一些部队的干部子弟。“红旗”成立以后，我就陆陆续续介绍人参加进去。很快，就进入了“红八月”，“红旗”也开始打人。我几次警告他们不许打人，抄家。我说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不能动手打，这是一个杠杠。他们屡次犯规，我就把这些人全开除了。之后，我就又拉起来一个组织，“八一八红卫兵”，但也没和“红旗”完全分道扬镳。因为我在那时候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我有支配“红旗”那帮人的地位。“红旗”这帮人还是比较单纯的，除了“血统论”，在别的方面跟我们是一致的，但是这帮人就是打人。拿坦克兵的皮带打人，他们拿出来给我看的，皮带上的大铜扣都打弯了。

我们一宣布成立“八一八红卫兵”，人马上就扩充起来了，就在学校里具有很大的势力，因为成立之前就有基础，已经有一部分人了。具体成立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据后来批判我的28中“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的传单说，“八一八红卫兵”是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

那时，学校里有个牛鬼蛇神队，包括书记、校长、教导主任、老师、还有右派，里面还有我们学校资格最老的北京市特级教师赵光宁。他们也挨打了，被打得也够狠的。但是打得最凶的，实际上是六中的红卫兵过来打的，不是我们本校打的。我亲眼看到六中的王XX、朱XX到28中打人，打老师，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八一八红卫兵”一成立以后，我立刻宣布：28中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随便批斗老师和学生；解散“牛鬼蛇神队”，让他们回家交代罪行，需要批斗的时候随叫随到。那以后当然不是绝对不斗，你要是抓住什么把柄还是可以斗。

“牛鬼蛇神队”解散以后，有次六中的朱XX来了，我就当面跟他们说，以后再到28中打人，我们就不客气了，就要收拾你了。我们的革命我们自己搞，不需要你们来包办代替。当时，我还威胁他。我说，你爹还是那个模样呢，你还来打人！我看过毛主席著作，知道一点他爹搞左倾整人后来被毛主席批判的历史背景。

我做的这个政策性的调整，对制止打人还是起到了作用。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对我特别好，文革后他当了西城区副区长。他们当时都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少受了好多罪。我们这个组织成立后，就没有再像“红旗”那样再出现打人的现象。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左的东西，还是不敢抵制。我们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上，实际也是迫于当时“血统论”的压力，搞“红五类”。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是小业主出身，他来找我，想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我当时就说，你先别来，你进来影响不太好，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虽然社会上不同意“血统论”人很多，但气势上压不过对方，还是屈服于左的势力。

成立“八一八红卫兵”前后，我在社会上什么活动都没参加过。其实，当时社会上开的各种会，辩论会、批斗会，我一个都没有参加。我天生不爱凑热闹，就窝在我们学校那块地盘里。我们这个组织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很快发展起来，最多时大约到了1400人，占全校人数的一半以上了。

红卫兵成立的时候，把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会的干部全给抛开了，但这些人学校里是有威信的人。后来，他们全到我们这边儿来了。可以说，学校里原来最优秀的分子后来全都集中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里来了。当时没有叫总部，有个核心组，大概七八个人吧。

◇ 破四旧风潮

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

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

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4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4000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200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5000块钱，但这事我不记得了。

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结，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

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 侯瑛、李红旗谈抄家

侯瑛插话：当时我们学校对面这块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南边尽是名人的家，特别多。那一块儿住的尽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那时抄家也特别厉害，全是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当时我觉得我们抄家是保护性的。如果我们不去抄，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贴上封条后你别的红卫兵就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红卫兵”抄了一家，就是学校对面大院的一家。后来，那个人见到我就跪着磕头，他不是害怕是感激。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的一家，“八一八红卫兵”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红旗”就特恶劣。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

其实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

李红旗插话（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红旗”成立后，找过我，

但是我没参加。我看不惯那些人，也不想过深地介入。当时群众也看不起他们那帮人，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我不大认同。“红旗”这个组织，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我记得，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30多个人，每人买一双，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了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书也给撕了。

抄那个北洋政府姓刘的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主动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他们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其余的我们封存了。侯璜插话：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送到银行，人家还不收。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这收条我交给他家了。

◇ 参加“三司中专部”

王宇：“八一八红卫兵”成立以后，我们感到有点迷惑，找不到方向。除了抄家破四旧，这革命的下一步往那走啊？所以我就想到社会上找一找路子。

我先跑到西四，九三学社那个地方，那里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办公地点。我要求加入他们的组织，结果去了以后，问了这个，问了那个，没人搭理我。我一生气，去你妈的，你不要我，我也不要你呢。后来听说文化宫里头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我就跑到那儿去了。这三个司令部里面，当时我听说“三司”最革命。我们到那儿就参加了“三司中学中专部”。它的“中学中专部”当时有三个人，太平桥中学一个，铁一中的金X，还有四十四中的刘X，等于也就是有三个中学参加了，我们是第四个参加的。继我们之后，三十一中又来参加了，我记得还有景山学校的。我们算是第一批的，接着就有很多学校来报名。对很多后来报名参加的怎么办，我们就开会讨论。三十一中坚决反对对所有的组织都吸收，说要严格审查。我说，不行，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组织，愿意参加的你参加，愿意走的你就走，把口直接放开。当时领导我们的是北京大学的高XX，代表大学生领导我们。他同意我的意见，后来就决定放开口子，这样，哗哗的好多人都来参加了，队伍立刻就壮大起来了。对“三司中专部”的发展壮大，我是出了一把力的。

在和社会上建立了联系之后，我就退出来了，回到学校，派了一个同学代表我们学校“八一八红卫兵”参加“三司中学中专部”的领导。

10月18号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前，“三司”召集我们开紧急会议，说这个口号（1）变了，因此要抗争。我看了半天，说可能我水平低，我没觉得有多大区别。他们就做了一番解释。我回去以后越想这事越不对头，我们也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我说咱们不管什么口号不口号，有什么内容，这事要一错了，咱们就完蛋，可能是要掉脑袋这种事情。当时大形势在那，我们又不能躲。我说，你们跟在后面，别站在前头去，人家往上冲，咱跟在后面就行了。

毛泽东那次接见，没有采用红卫兵游行的方法，而是让红卫兵站立在街道两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坐敞篷吉普车进行检阅。毛泽东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然后车队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行进。当时，我在北太平庄那里当红卫兵纠察连的连长。回来后我一问，也是吓出一身汗。据说毛主席的车从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转了一圈，一拐弯的时候，群众队伍哗就把毛主席的车队一下给截断了，把后面的车全给截住了。后面的车后来拐个弯才追上毛主席的车。

◇ “发出红光”的毛泽东

那次接见时，我是头儿，站在警戒线的最前边，只有我一个人。毛主席的车远远的过来了，我确实看见毛主席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而且我觉得他身上发着一种红光。

当时对毛泽东确实是崇拜，这个不能否定。但是我这个人是不迷信，也不是搞个人崇拜的那种人，有人把毛泽东说得多么的高我也不相信，因为这不符合人类的规律。我记得，当时我对把毛泽东说成是“顶峰”表示不理解。侯瑛还跟我解释说，当代，你要看这两个字，他只是当代的顶峰。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的人，他们容易脑瓜糊涂，但我不是那种人。见到毛泽东，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激动。可是我确实感到他身上发着一种红光，记忆特别深刻，就觉得毛主席不是一个凡人。中央首长肯定有特殊的保健品吃，因为我跟周恩来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不同寻常，特别的嫩，说的不好听像南豆腐一样，特别的柔软。

在这次接见之后，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了。我说干脆走吧，串连去吧。我们一串连就出去了一两个月。到了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从重庆往南走，又到了桂林、长沙、韶山。

等我们串连回来以后，“三司中学中专部”那边已经变质了。一帮人在“三司中学中专部”那儿混，吃点儿、喝点儿、砸点儿，反正就是乱折腾。我跟“三司中学中专部”他们来往时，只有一家。这时发现他们分成两家了，有两个招牌，还所谓的真假之争。一拨是以三十一中为首的，还有一拨是几个中专的。两拨人在文化宫那边争领导权，然后三十一中这拨人呢，头儿姓孙，他就领着人把“三司中学中专部”弄到四川饭店去了。

我听说过这件事，但对详细情况不清楚。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比较支持在四川饭店办公的那个，也就是以三十一中一帮人为首的那个。他们把抄家抄来的那些东西，也搬到四川饭店了，因为四川饭店离三十一中很近，在那儿逍遥去了。然后两拨人就互相说，我是正统，你是假的。这以后，我就跟他们不来往了。

◇ “四三”发言

到1967年初，社会上的事儿我们就参与了。中学红代会筹备的时候我是筹委会的委员，军训团通知我到西四去开了一次会。后来又通知说哪天哪天开成立大会。开大会之前，有好多人都来找我们，拉我们参加反对派。这当中就有很多熟人，如三十一中的、女八中的，这以后我们就有倾向性了。

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碰见李冬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前我不认识他。我们聊了聊，听他说话的口气是将来要提拔我。因为当时只给安排了我一个筹委会的委员，正式的委员中没有我，有点儿亏了我、将来给我弄上去的意思。

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不知是谁递给我一个条子，要反映什么问题，好像是跟军训有关系的，对军训不满意。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我就走到第一排，交给康生了。康生看了看，就给郑维山了。郑维山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看到满大街都在游行呢，我就意识到，这些人是有组织的。因为这些人跟我关系都比较好，我们等于是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但没有具体行动。后来就发生了“四·三”讲话。

“四·三”讲话那天，有人给我写了张条子，不知是谁，我也不认识，建议我上去发言。结果那天的会上我就成了主要的发言者，发言最多的除了周恩来就是我了。

我先说了李钟奇的问题。别人给了我一份李钟奇 2 的讲话，里面有他对“联动”干部子弟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我说，你这不就是“血统论”嘛！当时总理就叫李钟奇站起来，问有没有这么回事？李钟奇说，没有。我说，这不可能是假的，我这里有两份记录。我也不认识你，但不止一个人给我说这件事，还有当时的会议记录。

总理说，李钟奇同志是东北军的，是在六盘山下起义的，排长，也没有多少文化。后来，李钟奇作了检查，这事就过去了。

我还收到了另一张条子，是说一零一中的胡 X、吴 XX 被军训团关起来了。我说，这些都是学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军训团一来就把人关起来了。总理跟他的秘书说，赶紧派车把他们给接过来。

还有人给我递条子说，二十七中的梁 XX，正在人民大会堂外边的门口闹，要进来。我就跟总理说了。总理说，那你去把他们叫进来吧。我就走到大门口去把他们叫进来了。

“四·三”这个大会参加的人相当多，没有一百人，也差不多。你想想，那帮大头目有多少？你往下数啊：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丁国钰……光他们那帮中央领导人，我估计就有二十多个，所以整个加起来，最少也有七八十人。

◇ “四三”得罪了军训团

侯瑛插话：“四·三”讲话那天，是秦喜昌 3 找的王宇。那会儿，社会上的事王宇他不管，外头的事都是我去办的。这样，秦喜昌先找到我，我告诉他到里边去找王宇。当时秦喜昌说，今天晚上首长接见一些中学生的代表，听听对军训的意见，让王宇准备准备。

在会场上给王宇递条子让他反映意见的是赵 XX。4 赵还到我们学校找过王宇，赵跟谢富治关系特别好。王宇上去讲了一通，接着又有人给他递条子说李钟奇的事。

之后，王宇又干了一件让军训团等特别不高兴的事。在 3 月份的时候，二十七中的梁 XX 组织“铁军”，已经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取缔了。梁 XX 过去在“三司中学中专部”的时候认识王宇，就来求援。然后王宇就发动西城区我们认识的好多朋友，像三十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六中的，就声援去了，搞了一个声援大会。骑自行车游行，到学校喊口号、贴标语什么的，我们俩都去了，搞的声势比较大。原来西城区军训指挥部的郭副司令员跟我说过这事，他的意思是说，你王宇是左派，我们承认你，也支持你，你不要到社会上管那些闲事去。“四·三”那天，梁 XX 就在大会堂门口啊，别人又递条子，王宇就当着总理的面提出要让他进来。所以就又给军训团来一个下不来台。

梁 XX 进来以后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说的比王宇说的过激得多。我觉得王宇当时在“四三派”的大群体里，始终不是那种过激派。但那些人都跟他是朋友，他又好打抱不平，这个事就非常麻烦。结果呢，我觉得他有点代人受过的意思。军训团特恨梁 XX，你非要帮他说话，人家就恨你呗，就这么回事。因为那天我参加整理记录稿，看得比较清楚。

最后首长有一个讲话，是谁说的忘了，是总理说的还是江青说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讲话不要传出去，李钟奇同志呢，还是个好同志，他已经承认错误了。结果呢，那天王宇临走时告诉我，你别走，你回家里等着，回来要整理这个讲话稿。结果我们那天夜里有好多人在学校等着，还有六中的，都是附近各学校的。当时王宇、六中的康 X 他们几个说，把“四三”讲话

连夜刷到长安街上去。

所以第二天下午秦喜昌又来了，埋怨王宇。他说，你看，昨天首长说了不让传出去。得了，今天晚上还得去一趟。结果又出来“四四”讲话了。“四四”讲话整理出来又跟“四三”讲话不一样了，反着了。

◇ “四四”讲话

王宇：“四四”那天开会，人去的比较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主要是戚本禹讲了些话，讲话的时候，戚本禹问我，看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吗？我站起来说，看过。他说你对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我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革命斗争当中解放的包括我们自己，改造我们自己。结果他也没说对，也没说错。另外他在谈到军训的时候说，那些战士都是些孩子，跟你们岁数一样，个别的比你们还小。

接着，戚本禹让我站起来，把我训了一顿。他说，28中的王宇，昨天说好了会议讲话的内容不要传出去，结果还是上街了，听说是你干的事？

其实，这件事是很多学校一起干的。因为28中离人大大会堂最近，所以大家就到了28中。28中倒霉就倒霉在它这个位置，它是北京离天安门、的一个学校，大门就在长安街上，又和中南海一墙之隔。我们“八一八红卫兵”出名也和这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李红旗插话：因此，“四三讲话”整理稿子的地点也是在这里，然后从这里把稿子发出去，大家去贴，然后大家印传单。

侯瑛插话：从南长街开始，一直到中南海这个小门，西长安街两边那个莲花形路灯上边的喇叭都是我们学校的。不是市政府的那个，是我们自己安的高音喇叭，就是那种25瓦的喇叭。那会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喇叭，都接到原来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总部旁边学校的播音室里。这样一广播，中南海里也听得清清楚楚。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